

# 章培恒先生素描



《先生素描》  
丁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7月

## 1

章先生让我更加敬佩的地方，是他品行当中的大度。遥想当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对学科目录进行调整，在征得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学科组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献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此举不仅引起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专业的诟病，更引起了章先生的强烈反弹，介于当年讨论学科目录调整时大家认为是符合教育部缩减专业规模精神的，却没有考虑到传统特色专业的特殊需求。章先生麾下的古籍所当时是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重镇，拥有强将三十六员，首当其冲，却因我们的疏忽给他们的学科发展与人事安排带来了危机和困难，虽然后来纠正了，但大家还是心有愧疚。

在学科组会议上，章先生发脾气了，他慷慨陈词，无情地抨击了这种忽视重要传统特色学科的做法，作为一个南大人，而且又是学科组秘书，我战战兢兢地记录完了章先生的意见，提交给学位办，连续几天都不敢正眼看章先生。然而，最尴尬也是最麻烦的事情被我遇上了，当学科组的许多文件需要每一个委员签字时，我思忖了半天还是不敢贸然上前请章先生面签。只见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打盹，我硬着头皮过去，轻轻唤了一声“章先生”，他突然抬起头来，叫了我一声丁先生，顿时让我又惊又愧，惊的是前辈称呼晚辈“先生”出乎我的意料，受宠若惊；愧的是我们多有冒犯先生之处，先生却对此事毫不介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仍然对我和颜悦色，与我谈笑风生。

再后来，我们为了学科的事情去请教章先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校友许志英先生出马，请复旦大学年轻的校友王彬彬带队，组成三人团队去拜访章先生，先生仍然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谈吐自如，得体大方，没有一丝前嫌过节之感。想起这些往事，不由得让人敬佩章先生的胸襟和他大度的为人之道。

更让我不能承受的心灵之重的是那是在复旦大学评议章先生增设“古今演变史”专业的会议上的一件小事，它让我一生都觉得亏欠先生太多太多了。那日我的回程火车票是下午三点多的，饭后我欲直接去车站，章先生非要在宾馆开了钟点房让我休息后再走，司机就在楼下等候。哪知道一个多小时后我下楼时，章先生居然带着一帮研究所的弟子在楼下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等着为我送行，顿时我真的是蒙掉了，只觉得无地自容，像我这样一个晚辈，何德何能，怎能经得起如此大礼？不要说我，平辈学者都经不起，惊动一个拖着病体的前辈大师，这让我手足无措，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每每回想起那感人的场景，我的脊梁骨上冒出的都是冷汗，再由冷汗变成了热汗与热泪。

## 2

吴中杰先生对章先生的酒事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章培恒很有豪情，喜欢喝酒，而且酒量不小，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他在二十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酒馥难耐而身边缺钱，只能买七块钱一瓶的尖庄酒来解馋。以前我在曹雪芹研究资料里读到过‘酒馥

如狂’的描写，原以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夸张之辞，读了培恒兄的文章，才知道确有酒馥之事。我问他怎么养成喝酒习惯的，他说他祖母喜饮，在他幼小时就常用筷子蘸酒给他尝，再加上他父亲开酒坊，取酒非常方便，所以他从小就就能喝酒。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渐多，大家一起喝酒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山大学吴宏聪教授到上海开会，贾植芳先生、培恒兄和我一起请他在复旦招待食堂吃饭，已经喝过几瓶啤酒了，培恒兄又去买了两瓶加饭酒，宏聪先生不知绍兴老酒的后劲足，初尝之下，觉得度数不高，也就放胆大喝起来，不料喝得大醉，吐得一塌糊涂。他回广州之后，贾先生还写信去慰问，消息泄露出去，被吴师母知道了，就把吴先生狠狠教训了一通。

“但培恒兄说，吴宏聪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喝醉了没有什么稀奇，他最得意的是与何满子一起喝酒，何先生三次败阵，而何先生在文人学者中是以善饮闻名的。这一次也是吴宏聪先生来沪，章培恒请客，何满子先生等作陪，喝的是绍兴黄酒，这回宏聪先生有经验了，不敢多喝，何满子先生却喝得大醉。何先生不服气，说他是专喝白酒的，不能喝黄酒，所以醉了不能算数。第二次，他们喝的是竹叶青，何先生又不行。竹叶青是白酒，但有些甜味，何先生说，他是不喝甜味酒的，所以也不能算数。第三次是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组请一些专家提意见，朱维铮带了一斤董酒，他们请何满子先生一起饭后小酌，董酒既是白酒又无甜味，应该合何先生胃口了，但何先生过来一看，说：你们怎么没有菜光喝酒？没有菜，我是不能喝酒的。这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培恒兄洋洋自得。”

## 3

许多学者将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研究方法归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窃以为，先生读书的那个时代流行的就是马列文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了苏联文艺理论的熏陶，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毕达柯夫《文艺学引论》教材的影响。但是，历经多年的方法论的鉴别，正确理解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才是一个学者最宝贵之处。我以为，仅先生“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和“打通古今演变”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大的汲取和运用，足以立足于学界百年，因为人性与批判价值观形成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而所谓“现当代”是一个正在无限延长的一种时间段，它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不断流淌，而非一个重新开掘的河流。所以，这也成为章先生后半生治古今文学史一个独具慧眼的亮点。

当年，章先生和骆先生的文学史皇皇巨著出版时，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热议讨论，无疑，他的治史观既得到了许多同仁的赞同，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同仁的质疑，而现当代文学界却无发声，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我却是非常欣赏先生这两个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于是，便与傅元峰在2007年12月6日的《文汇报·读书周刊》上以《激活文学史的经络——简评〈中国文学史新著〉》为题，发表了管窥之见。

显然，章先生注意到了我们这篇文章，随即打电话给我，请我们就此观点生发开来，再写一篇长文，先生的邀请让我诚惶诚恐，一是自知学识浅薄，害怕这种跨学科的文章写不好会被内行高手诟病；二是觉得尚需查证更多史料来支撑我们的观点，要花费很多工作量，一时难以成文，所以就暂时搁置下来了。孰料，没几日，先生又电话告知：已经请《文学评论》的主编胡明先生留下了版面，请务必操觚。那时候我正赴中国台湾东海大学讲学，百事缠身，由此就一拖再拖，每每想起，实在是愧对章先生和胡明先生了。这么多年来，时常想起这笔文债，寝食难安，让我对先生的厚爱感到深深的内疚。先生驾鹤七年，我们应该还这笔文债了，以此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章先生追悼会的举办日正值我在外出差，没有能够亲临现场送别，而他的几次追思会和纪念会我都没有去，就是想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哀思。我以为章先生肯定会对我笑着说：是，是，是。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也会假装幽默一把：章先生，您生前，我喊您章先生，您走后，我可叫您章大师啦。先生仍然会笑盈盈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 史沫特莱： 总忘记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史沫特莱著 丁帆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 内容简介

《先生素描》写学问大家、当年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三陈”（陈瘦竹、程干帆和陈白尘）；写给丁帆带来求知启蒙的扫地僧一样的图书馆管理员；也写专业外的大众也熟知的先生们：范伯群、何西来、刘绍棠、潘旭澜、钱谷融、孙中田、汪曾祺、王德威、王富仁、许志英、叶子铭、叶至诚、曾华鹏、章培恒、邹恬……其中许多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再寻找他们曾经的言行举止、曾经的趣事和风格、经历和故事，已是十分难得。在记叙这些以一肩之力、开一时之风的“先生们”的时候，不煽情、不设虚笔；只谈细节，只记事实。笔触沉静，不蔓不枝，烘托出“先生们”在学术、教育等方面的璀璨光彩。正是丁帆从容的讲述，汇聚先生们于一书，形成了永恒的纪念。

### 作者简介

丁帆

1952年生于苏州，久负盛名的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评审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史沫特莱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即她在中国的岁月，她不断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章，并著书出版，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对史沫特莱与斯诺的著作作了这样的对比评价：“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试图给西方公众描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来对广大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显而易见，史沫特莱与其说是一位新闻记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宣传家，而斯诺在我看来，恰好跟她相反。”作为汉学研究专家，费正清十分肯定史沫特莱有关中国的著述，“她的几本论述中国革命的书仍然颇有价值”。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及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史沫特莱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革命，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斗争，她说“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史沫特莱在书写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战时，即便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态度亦不可能超然，因为她不仅在观察，也在帮忙，甚至参与。诚如她在华北随八路军转战期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说：“日本有卡车、飞机和别的高效能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只有毛驴、马匹、几头骡子和人员……我向你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高兴、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这不仅表达了她自己乐在其中的心情，也以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中国军队的困难及中日军力的差距。

以日记体、书信体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记录了史沫特莱一路的观感与认识：成功的民众动员是抗战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感动于中国军民艰难抗战的同时，史沫特莱深深同情中国伤兵的痛苦，公开批评英美等国的自利行为：“中国军人可以由于美国和英国向日本供应的作战物资而受伤，却没有资格得到这两个国家的药物供应，除非是中国政府在纯商业

性的基础上加以购买。”她在远东的一些真正的美英民主主义者一样，批评美英奉行的绥靖政策，认为“听任日本人在中国身上消耗到精疲力竭而让我们置身于战火之外”实乃帝国主义的罪恶政策。

史沫特莱认为美国公众已被荒唐错误、掩盖真相的报道所蒙蔽，“抗战三年多来，国民党军队被许多友邦人士看不起，说得一文不值。他们常说：中国不能打，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将军腐败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黄口小儿；伤兵可恨无人过问。有些指责属实，有的指责不对。不管正确与否，几乎一切指责均由对中国欠缺明确的认识。”她大声地用力地为中国呐喊，“中国是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

在走访华中游击区的过程中，史沫特莱也看到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分化，揭露了国民党黑暗的一面，讴歌了一些坚持抗战不畏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报道了国民政府中对待共产党人的不同行为，如安徽省主席“按月给新四军在安徽中部的几个支队拨付两万元津贴，湖南帮和CC分子都竭力劝阻而无效，省主席的理由是，新四军的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他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

1941年5月，鉴于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亦因身体原因，史沫特莱决定返回美国，“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她自认自己“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与同样访问过国共两方军队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相比，史沫特莱自认因“深陷”中国而不如他“客观冷静”，“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史沫特莱的耿直一如既往。在《中国的战歌》最后一节，她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章”。她希望重返中国，遗憾未能如愿，在取道欧洲来华的过程中，不幸病逝于伦敦。在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恳请将其骨灰送往中国安葬，并嘱咐友人“我的著作所得，无论来自哪国，都请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照他的意愿使用，以有助于建设一个自由、强大的中国”。她的遗愿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情感。